

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新北市：遠足文化，2021。503頁。

黃克武\*

本書是林孝庭先生繼《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9-1988》（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黃中憲譯，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英文版為 *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兩書之後，另一本有關戰後台灣的重要著作。本書不採編年式的歷史書寫，在導論中先簡要介紹蔣經國（1910-1988）的早年經歷後，另分三篇：「軍事情報·敵後·政工」、「對外關係」、「本土化·民主化·民生建設·兩岸關係」，其下再以不同主題安排各重要事件，分別敘述「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此一架構以蔣經國為「情報頭子」的身分為底層，分析情治系統的建立、中美情報合作、敵後工作與白色恐怖中蔣經國之角色、劉少康辦公室等來描述時代背景，其次再以對外、對內的措施，描述蔣經國的經歷與各種作為。結論則是對其台灣時期的功過做一評價。

本書和作者以往的幾本著作類似，都是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蔣中正、蔣經國總統文物、國民黨黨史資料、宋子文專檔，與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外交部等相關檔案，再配合大量的二手研究，嘗試描繪出蔣經國台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灣時代的歷史風貌。本書最大的特色是首次大規模地採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2020 年初公布的「蔣經國日記」，且將此一史料與蔣介石日記併用（老蔣情資很多來自小蔣），因而揭露了許多以往所不知道的歷史細節與關鍵因素。比較可惜的是，蔣經國日記只寫到 1979 年，其後的一些重要事件則缺乏日記的佐證。大量運用蔣經國的日記來從事歷史書寫是本書與以往有關蔣經國傳記，如漆高儒的《蔣經國評傳：我是台灣人》（台北：正中書局，1997）；陶涵（Jay Taylor）的《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林添貴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最大不同之處。漆氏曾追隨經國先生多年，對其為人處事、待人接物、領導風格有許多一手的觀察；陶氏受余紀忠先生委託，一方面利用各種檔案，再佐以大量口述歷史（訪問兩百餘人），而將蔣定位為「現代化的推手」。然而他們都沒有看到「蔣經國日記」。筆者所主持、出版的《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上、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也是如此，皆是記載他人眼中之蔣經國形象。目前市面上另一本利用蔣經國日記所寫的書，是黃清龍的《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不過此書是偏向通俗性書寫（例如比較關注大家所關心的蔣與章亞若之關係與人物評等），利用的日記內容也比較有限。

總之，本書參考各國檔案與二手研究，給予關鍵時刻的政治領袖一個客觀公允的評估。在書中我們看到，蔣經國以務實精神面對挑戰而調整步伐，以「反共」、「聯美」、「保台」的三角戰略，渡過重重難關。中華民國至今屹立不搖，2,300 萬人享受自由民主的成果，蔣經國無疑地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此一結論亦符合台灣中國近代史學界之共識。

如上所述，本書的另一個重要成就是「細節」。作者利用日記史料彰顯蔣經國的兩面性格，表現了他愛恨情仇、徬徨、苦悶、深沉的痛苦，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生命，而具有「意識型態與務實傾向相互鏽鑄的政治特質」（頁 464）。書中有關蔣經國性格之兩面性的描寫最為成功。例如：

一、他與美方駐台情治人員之交往。日記中揭露他與美方藍日會、克萊恩（Ray Steiner Cline, 1918-1996）的社交活動。雙方一方面分享機密情報，合作角力，相互利用，勾心鬥角，另一方面彼此又坦誠交心，開慶生會、一起出遊等。其中，又以藍日會（英文名不可考）的角色與兩人間的交往最為神秘，且為外界以往所不知。

二、對美國的態度。蔣經國深知確保台灣安全需要聯合美國，卻又懷恨在心，認為美國「不願真心支持反攻大陸」（頁 464）、「美政府即是支持本省人反抗國民黨、鼓動實現台獨的幕後黑手」（頁 349，對蔣經國而言，另一個幕後黑手是共產黨）；而美國對他也是既拉攏又有戒心與負評（留俄的背景，又娶俄國女子為妻的「共產黨員」、「親共人物」，頁 464）。書中描寫美國駐台人員對台灣內政、外交插手牽制，如反攻大陸、敵後工作、情治政工等事事都管，且態度強硬。作者對吳國楨、孫立人案和劉自然案與美國的關連有精彩的描寫與分析。以孫案來說，孫利用美國來批評小蔣搞政工制度，但出事之後美國卻不出手拯救。由此可見，蔣經國處理此事的手腕十分高明，同時作者亦注意到下位者的揣摩上意此一重要因素。

三、有關蔣經國、陳誠關係之描寫，充分展現兩人之間的心結。如頁 69，劉自然案發生後，「小蔣自記，陳誠逢人就說這都是『蔣經國幹的好事』」。很可惜我們沒有陳誠 1957 年的日記，無以對比。又如頁 218，1961 年小蔣「聽到陳誠對美記者說，與甘迺迪的晤談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間」，私下批評此一說法「實在過分了」。兩人之間的濃厚心結，可見一斑。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小蔣「內心世界」呈現兩面性格。作為情報頭子，他對敵人與「叛徒」十分兇狠，更痛恨美國、共產黨支持反對運動，這是出於對本身「愛國」之舉深具信心，而在外表上，他又有親民愛民之慈悲。在政治措施方面，他在「開明」與「保守」之間擺盪。他肯定民主化、本土化是必走之路，但「又缺乏民主的 DNA」，時時惦記著維繫國民黨統治。作者認為他的兩面性源自他與父親蔣介石之關係。他曾留學蘇俄接受社會主義洗禮，又接受

家傳的儒家聖王思想與基督教信仰，誠如王作榮所說，蔣經國是史達林與包青天的混合物。本書較少觸及蔣經國的基督教信仰，似乎他的宗教信仰不如蔣介石那麼強。

作者在歷史書寫方面的成功，不只是因為他利用蔣經國日記，同時在於以大量的檔案（美國、英國、日本、國史館檔案等）來補充私人的敘述，因而將日記史料放在一個更寬廣的歷史脈絡中，充分展現出史家的技藝。這些檔案有一些可以用關鍵字檢索，有一些則需要披沙揀金。例如作者從美國 USSD 的微捲取材，將這些四千多頁的檔案印出來，一頁一頁地翻查，才找到可用的材料。另外，他也援用英國 F.O. 371 檔案，這是當時在淡水英國領事館對外交部門所做有關台灣政情的報告，其中有許多美方所未能掌握的情資。難怪蔣經國在 1959 年的日記中認為「美國情報人員亦並不高明，德國、日本與英國之情報人員，遠較美國人精明」（頁 85）。有興趣研究此一段歷史的學者，如果仔細檢查作者在頁 484-489 所用的各種「原始檔案、史料、文庫」與「出版史料、微捲檔案」，並參酌書中使用史料的方法，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啓示。

作者在史料運用上有少數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未能進一步追查相關資料，來確定歷史的精確性。

一、頁 73：蔣廷黻向小蔣提出的忠告，「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於 1956 年春返台述職時即曾向小蔣忠告，爲了前途與事業計，不應再碰政工與特務工作，並語重心長勉勵小蔣，應努力把『蔣經國的名字與人民有利的工作結合起來。』」作者如能對照英文的《蔣廷黻日記》（*Tsiang Diaries, 1944-1965*），看到蔣廷黻的紀錄，應該可以有更精確的描述。（1956 年 3 月 10 日《蔣廷黻日記》有與經國先生見面之記載）

二、頁 215：「九月底，發行於香港、影響力遍及亞洲與北美華人社會的《聯合評論》刊出一篇文章，疾呼『經國不去，台灣難安』，倡言小蔣去國的時間點不能遲於翌年（一九六〇）五月」。這一篇文章是 1959 年 8 月 21 日《聯合評論》所刊出的徐亮之，〈蔣經國出國是時候了〉。出版時間是八月底，小

蔣日記所記是他看到此文的感想，非出版時間。

三、頁 334-335：胡適見莊萊德（Everett Francis Drumright, 1906-1993），「一九六〇年秋天胡適向美大使莊萊德透露，他已和高玉樹、李萬居等人秘密會晤，晤面之前胡適曾向陳誠請示機宜，陳誠透過胡適告誡高、李等人『不要衝太快』，應設法爭取民社黨與青年黨等外省政治團體的支持。美大使則警告胡適，儘管華府認為國民黨正致力於建立一個較為開明的形象，但蔣介石絕不可能坐視反對黨公開成立，挑戰其領導威信，在美方看來，這是老蔣身為最高領導人一道不可被跨越的政治紅線。」這一條紀錄如能補充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與陳誠（《陳誠先生日記》）方面的材料，可以更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雙方見面的時間是 1960 年 11 月 5 日。胡適記載「六時半，參加莊萊德大使的宴會，飯後有音樂會」。胡適與宋英、李萬居、高玉樹、郭雨新見面的時間是 10 月 23 日上午與 10 月 26 日晚間。根據陳誠的日記，胡適見陳誠的時間則是 10 月 26 日上午「十時，適之來訪，談及反對黨問題」。11 月 4 日陳誠見蔣經國時又告知他曾與胡適見面，「繼談與適之談話情形，經國兄認為胡與李、高等交往，實自降本分，太不值得」。

以上這些地方如能參酌相關資料，可以讓記載更為精確與深入。

書中有一個核心的論點，認為「蔣經國沒有民主 DNA」。誠如作者所述，蔣經國可能沒有民主的 DNA，他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受社會主義影響很大，沒有瞭解民主、人權等價值的機會，而且也未打從心底肯定美式民主的價值，並批評選舉。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中華民國有民主 DNA，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的憲政架構是使蔣經國走向台灣民主化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其中還有好幾點值得詳細討論。

首先，就蔣經國個人而言，他具有傳統中國民本的 DNA，他相信賢人政治、愛民（心中有人民），生活儉樸、體察民瘼、同情弱勢、毅然以天下為己任。他也瞭解權力的節制，而時時克制自己。他反覆強調：蔣家人不繼任，要終結家天下。風燭殘年時，他「真心想推動民主化」（頁 372），「當冷戰走

向盡頭，而民主與法治逐漸成爲核心價值時，已步入晚年的蔣經國能夠認清大勢，明知國民黨可能丟失執政權的情況下，依然決定開放黨禁，著手終結威權統治與強人政治，並開啓民主化進程，著實需要一番智慧與勇氣。」（頁 465）作者指出他敏銳地看到時代的變化，堅持反共、聯美、保台之三角戰略，以政治強人的高度打開新局，而成爲轉型時期的關鍵人物。

至於蔣經國如何從聖君賢相、情報頭子變成民主先驅呢？書中雖注意到這個問題，然而卻沒有完全解釋這個轉變是如何出現的。此一變化有非常複雜的內外因素，除了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之外，其他有幾點值得考慮。第一、蔣有深刻的「自覺」，1971 年 5 月 7 日的日記最能反映此一心態（頁 352）。他理解到今日的政治是現實的，已非二十年前初來台灣及推動「白色恐怖」時的政治環境可比擬，他寫到：

必須致力於改革政治，以安人心。此為安內之急。……新舊兩代之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可能發生嚴重的後果。總之，自己如果不從事改革，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當政者雖有一番好心，倘使沒有積極的行動相配合，老百姓還是要反對政府的。

此時蔣經國開始注意到在台灣新舊二代、「外省人」與「本省人」、政府與人民的緊張與衝突，但他沒有說是階級矛盾（此時或許尚不明顯）。對他而言，1970 年代時新舊兩代的矛盾與本省、外省的地域矛盾是社會衝突的核心，而推動改革才能解決這些問題，而避免「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

二、蔣經國本身地位的改變：從幕後走向台前，1960 年代以後他又多方結交台籍友人，這種地位的改變也使他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台灣的將來。

三、外在情勢的變化：如美國對台政策改變、大陸鄧小平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壓力。書中對此著墨頗多。

四、反對勢力的壓力：台灣內部自由主義者與港台第三勢力對兩蔣的批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拙著《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一書指出：第三勢力左批中共「黨天下」，右批蔣氏父子「家天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所感到外界批評他「家天下」（頁 461）的壓力是第三勢力所造成的。因為有港台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動員，使「民主」而非「傳子」才有政治的合法性。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黨外運動」，如美麗島事件所帶來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誠如吳乃德在《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台北：春山出版公司，2020）所指出的，台灣民主運動歷經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後不退反進，獲得更多民眾同情與支持、更加澎湃洶湧，在此情況下，蔣經國無法繼續強硬鎮壓，只能選擇妥協，台灣民主運動持續不懈才是民主化最主要的動力。吳氏斷言：「美麗島事件其實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臺灣民主。」（吳書，頁 11）

五、蔣經國的決策受到周遭人物的影響：例如黃清龍指出王作榮的角色，陶涵的書中則認為余紀忠很重要。但是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關鍵人物值得仔細分析。

我們或許可以說上述幾項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促成蔣經國的轉變。蔣經國如何從「情報頭子」變為「民主先驅」，仍是一個值得進一步剖析的問題。

與蔣經國在政治改革與民主化方面相配合的政策是他的經濟建設。作者指出一個兩面性的矛盾現象。亦即蔣經國秉持計畫經濟的立場，他不瞭解自由開放的重要性，但是能夠知人善任，所以在 1970 年代中期引進人才資金技術，開辦科學園區，順應世界經濟分工的格局而發展。然而到了 1980 年代，蔣的經濟政策因未能即時開放而問題叢生。例如蔡辰洲十信案，即反映了政商關係與經濟法制的問題。

有關經濟方面的問題，根據費景漢的分析，<sup>1</sup>台灣經濟一開始即採取資本主義的架構，走非政治化的路（depoliticization）。他認為台灣的經濟成功是因為非政治化，此一因素超過國有經濟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這一種非政治化的

---

<sup>1</sup> John C. H. Fei,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ROC," in Ramon H. Myers, ed.,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91), pp. 97-110.

資本主義架構有傳統的根源，同時也因為國民黨採取實用主義的演化手段來應付經濟問題。在台灣，中小企業、社會分化、中產階級、民間社會的發展等因素環環相扣，因此或許可以說小蔣的計畫經濟思維在早期產生作用（如調動資源建立科學園區），但後來主要還是依賴陳誠以來的技術官僚所走的自由經濟的路子，才促成當時經濟發展。

作者在結論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察，他認為蔣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頁 459），而此一歷史經驗是獨特且難以被複製的（頁 475）。

根據此一論斷，台灣的歷史經驗對中國大陸可能沒有太大的借鑑作用。這一個議題值得深入討論。首先對蔣經國來說，他認為台灣民主化的努力將會推動大陸「經濟、文化和民主改革進程」，陶涵指出：

蔣經國相信，大陸的經濟、文化和民主改革進程，在台灣和俄羅斯經驗激勵下，將使中國走向他和國民黨已經踏上的同樣的自由化大陸之上。……他說：共產黨已經在改變，要迎合我們的立場，而不是我們去屈就他而變更立場。他相信，在台灣完成民主化，將推動大陸相同的動力，或許數年之內就可見到功效。<sup>2</sup>

蔣經國的自信有一定的道理。1949 年之後在台灣的人自覺地走出一種中國文化的現代型態。此一型態結合了資本主義、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與肯定儒釋道三教的精神傳統，培養出結合自由主義與儒家倫理傳統的市民精神。從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來看，此一路向對大陸未來的發展應該有一定的啓示作用。

不過另一方面，胡佛研究所馬若孟（Ramon H. Myers）所編的《對抗的二個社會：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之後》（*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一書，則注意到經過 1949 年之後的分歧發展，兩岸所發展出的社會有

---

<sup>2</sup>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頁 475-476。

三個關鍵性的不同：一、轉化與調適的不同，大陸傾向轉化，台灣多採取調適；二、政治核心種類不同，一為「無限制的政治核心」（an 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一為「有限制的政治核心」（an un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三、對傳統文化的不同態度。1960年代後，此一差異不是程度的差異而是系統性的不同（systematic differences）。<sup>3</sup>換言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缺少中華民國所有的民主憲政（選舉）、經濟自由基因，同時在社會上沒有中小企業發展與中產階級、市民社會的形成。再者，中國大陸沒有195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者、新儒家等「第三勢力」的歷史背景，也沒有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在《自由中國》時期所做的「思想動員」，以及黨外雜誌屢禁屢起、前仆後繼的努力。這樣看來，蔣經國一方面是時代的舵手，另一方面也被時代所形塑。台灣經驗究竟對中國大陸能發揮何種作用？仍有待時間的考驗才能下一定論。

總之，此書的豐富論述，提供了我們對「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個嶄新的認識與反省。任何對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歷史與兩蔣父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興趣的讀者，都不宜錯過。

---

<sup>3</sup> Thomas A. Metzger and Roman H. Myers, "Introduction," in Ramon H. Myers, ed.,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pp. xiii-xlv.